罪恶累累的沈垭天主堂

申雅　黎群

在鄂西北武当山的东南麓，房县、保康、谷城三县交界的木盘山区，有一个名叫茶园沟的山村。茶园沟西边的沈家垭子，至今还残留着一座立着十字架的高大钟楼，钟楼周围散布着一幢幢会院和经堂。这里，就是解放前外国传教士苦心经营了三百多年，号称“耶稣圣心殖民地”的沈垭天主堂。沈垭天主堂的历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害湖北人民的罪恶史。

“圣心殖民地”的由来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早在十六世纪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木盘山区就有了洋教士的足迹。这些殖民主义的先遣队，使用欺骗、贿赂等手段，取得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大肆发展教会势力。一七〇四年，罗马教皇下令中国教徒只服从基督教教义，强迫改变群众传统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思想，妄图将教皇的权威置于中国清朝皇帝之上。因此，一七二四年清政府颁发了禁教令，全国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驱教运动。武昌、安陆、襄阳等地的几百名教徒，相继转移到茶园沟，隐居传教，这个偏僻山沟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不久，北京耶稣会会长巴多明派洋教士前来整顿，一七三一年在茶园沟举行首祭，建立了教会组织。到了一八一二年，已有直辖会口十余处，教徒二千多人，建立起爱德会、圣衣会、无袖会等各种组织。沈垭天主堂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便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加紧进行侵略活动。沈垭天主堂以方济各会为核心组织，由主教南熙主持教务，大肆扩张。一八七〇年，洋教士勾结乡绅地主，在沈家垭子上霸占了二十多亩土地，盖起了住房数十间，修起了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经堂。一八七三年，又勾结教绅恶霸王宾，借口当地号称“香火胜武当”的名胜古迹玉皇顶是基督教的“圣山”，在山顶竖起十字架，改名“十字山”。一八七一年，建立小修院，作为修道们进行神职活动的据点。一八七六年，建立育婴堂，并附设华籍修女会。一八八七年，立“流传万古”石碑，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一九〇〇年，罗马教皇以沈垭天主堂侵略有功，正式命名为“耶稣圣心殖民地”，修建了“耶稣圣心堂”。

一九〇二年，修建了一座高达二十余公尺的钟楼，作为指挥教徒祷告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工具。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圣母圣衣会、炼狱会、公教进行会、青年会等几十个组织。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巢穴，便日益完备了。

在教区的划分上，从一八七〇年以来，沈垭划为总铎区（主教下的一级组织），属老河口教区。但由于沈垭天主堂根基深，不仅直接管辖房县、保康、竹山、黄山垭、高桥沟五个县区的教务，实际上是指导鄂北教务的中枢，也是外籍神职人员来华后接受训练和培养华籍传教士的地方，又被称为"训练流血的炼灵场所"。解放前，经这里训练的有"真福品"（罗马教皇对为教务而死的显著人物的称号）三人，主教二人，华籍司铎六十二人，散布于鄂西北地区的华籍传教士，大都是由这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控制了襄阳、郧阳地区十三个县的教务活动。据一九二〇年统计，这个地区已经有了一百四十五座教堂，三百一十五个会口，三万三千七百多名教徒。

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在这块"耶稣圣心殖民地"里，做尽了坏事，把一座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罪恶累累　血迹斑斑

沈垭天主堂的外国传教士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把自己装扮成"救苦救难"的"天使"，暗地里干尽了侵略、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凶犯。列宁指出："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帝国主义者懂得，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单靠炮舰是不行的，还必须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民，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沈垭天主堂正是这样干的。

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绞尽了脑汁。在沈垭天主堂的入口处，挂着一幅"天堂地狱图"。图上共分三层，最上层是"天堂"，一个臆想中的极乐世界，那里的人永远是年轻的，臂上长着翅膀，可以翱游天际，享尽欢乐；中间层是"炼狱"，熊熊烈火烧身，人们发出痛苦的呻吟；最下层是"地狱"，那里毒蛇缠身，猛兽噬人，受不尽的各种酷刑。神甫们还添油加醋地威吓说："人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天主安排的"，"只有为天主献身的人，死后灵魂才能直升天堂，一般人死后灵魂先进炼狱，灵魂受炼得救了才能升天堂，不能得救的入地狱"。妄图迫使中国人民充当帝国主义侵略的顺民，永远安于被奴役的地位。

为了扩大教会势力，培养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沈垭天主堂创办了安多尼修道学校，招收教徒子弟入学，实行完整的奴化教育。一九四六年，沈垭天主堂方济各会又办了神学院，培养神甫苗子，以便将来接班。神学院向学生灌输的全是唯心主义和反共反革命的毒素，并训练搞间谍活动的方法，以便刺探我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一个美国传教士供认："这样的学校在传教区内作了许多开辟传播福音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

办育婴堂等"慈善事业"，是他们用来欺骗中国人民接受奴化思想的钓饵。沈垭天主

堂从一八七六年建立育婴堂，到一九四八年止，共收容男女婴儿二万五千多人，绝大部分被帝国主义分子残杀了，解放时仅剩下六十多名残废者。天真活泼的婴儿一进育婴堂，就不准再同家里亲人见面。在那阴暗潮湿的破屋里，每十几个婴儿被放在一个木桶里，一个个粪尿满身，臀部长满了疥疮，饥饿和寒冷迫使婴儿相继悲惨地死去。帝国主义分子还借口防止传染，把生病的婴儿活埋掉，甚至把婴儿当作试验品，注射各种致命的针药。帝国主义分子安精修也不得不承认："在十七年中我们收到的婴儿二千二百名，其中一千二百七十四个死去了。"所谓育婴堂，其实是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杀人堂，外国传教士就是吞噬婴儿的凶恶豺狼！

沈埕天主堂的外国传教士们，是一伙敲骨吸髓地剥削中国人民的洋地主。他们勾结地方官吏，用强占、强买、诈骗、放高利贷、包揽诉讼等卑鄙手段，疯狂地兼并土地。例如，清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以陈立端反对天主堂为罪名，迫使地方官将陈家一百六十余亩土地充作天主堂的教产。为了霸占房屋田产，河口天主堂于一九一五年成立了"公教进行会"，豢养了被群众称之为"四大金刚"、"五虎上将"、"七狼八虎"等大批流氓教绅，主持施放高利贷。以四个月为一结帐期，年利三分。借债时要先扣除手续费，请得铺保，以土地房屋作抵押。到清帐时，则借故把借户抓进私设的监狱，进行残酷的捆绑吊打，强迫将抵押的土地房屋交给天主堂。结果，沈埕地区的良田沃土几乎全部被教堂占有；河口镇仁义街全部房屋均被天主堂霸占；光化县七个区，区区都有天主堂的田地。农民租种天主堂的土地，首先要交纳高出租额三倍的押金，每年还要把收获的五成、六成以上交给天主堂。沈埕天主堂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庄园。

除了地租剥削之外，天主堂还利用各种宗教仪式，巧立名目，向农民进行搜刮。例如，传教节每个教徒都要捐钱送粮；结婚要交婚配钱；求"炼狱灵魂"要交炼狱钱；请神甫念经要交经钱。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天主堂方济各会院志记载，当时普通弥撒四十元，婚配弥撒五十元，安所弥撒六十元，唱弥撒一百五十元，五六品大礼弥撒二百元。沈埕天主堂每年仅从宗教仪式和地租剥削中，就掠夺粮食三十六万余斤。替天主堂服无偿的劳役，是沈埕人民另一种灾难。帝国主义传教士生活用的豪华物品，都是当地农民从一百多里远的河口或谷城，一步一滴汗地挑上山去的。天主堂历届修堂建楼，都强行征用大量劳动力，从几百里外的大山上运来巨木和石条，不完工不能回家，砸断了肋骨，累弯了腰，天主堂的劳役一点也不能少。在天主堂外国传教士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沈埕讨米要饭的有五十二户，一百八十二人；卖妻子儿女的三十二户，三十三人；被害得家破人亡的四十八户，一百七十一人。老佃户周成义，因修道学校学生到地里摘柿子踏坏庄稼而说了几句话，就被帝国主义分子迫害逼死；其子周学荣因参加农民起义又被害死狱中，儿媳也被强卖；两个孙子和小儿子活活饿死；二儿子送给别家；一家八口，只剩下老妻孤身一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事实说明，沈埕天主堂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天堂，中国劳动人民的地狱。

沈埕天主堂的外国传教士们是一批搜集我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帝国主义武

装侵华政策服务的间谍。早在一八九二年，他们就曾窃取清朝密谕，寄往帝国主义间谍机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又搜集鄂西北会党活动情况，密报清政府，参与镇压革命的罪恶勾当。方济各会院院长、帝国主义分子艾国梁，一九二三年，一跨进中国的大门，就搜集各种情报，拍摄照片，寄回帝国主义间谍机关。一九二四年，他分别在宜城、枣阳、襄阳、郧阳、竹山等十五处设立情报站，搜集各种情报。一九二七年，当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活动于鄂北东津湾一带时，传教士不仅侦察我军的住地、人数和行动，并且勾结土匪，杀害了我党南漳县委书记胡子荣同志和竹山县委负责人杨楚南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天主堂的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日制手枪和收发报机，为日寇提供情报，指示日机轰炸目标，充当日本特务。一九四四年夏，艾国梁专门组织了一个八人情报组，搜集活动于南漳、保康一带的新四军的人数、武器装备、行动计划等情报，密报国民党反共军队。一九四七年，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给沈垭天主堂发来"情报提纲"。第二年，天主堂一名副主教携带我国山川地形和政治、经济情报资料，去美国间谍机关汇报，领取指示，获得大量活动经费。全国解放前夕，艾国梁重新组织方济各三等会，以此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派遣男会成员刺探我军政情况，把女会成员按地区分工，建立秘密情报网。铁的事实无情地剥掉了外国传教士"慈善"、"圣洁"的面纱，使他们现出殖民主义的谋士和奸细的原形。

沈垭天主堂的外国传教士们，是一帮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刽子手。一八九五年，天主堂以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推倒了他们竖立的十字架为借口，强迫清朝地方官将木盘山区划为天主堂与地方官府共同管辖区。从此，沈垭地区的行政权实际上落入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神甫即知事，主教即道台"，他们可以任意撤换地方政府委派的官吏，改派教绅担任，甚至可以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一九〇〇年，老河口主教以防备义和团为名，命令襄阳总团组织了两、三千地主武装，残害人民。当沈垭人民起来反抗，围攻天主堂时，他们立即命令地方政府派兵镇压。

为了维护他们的殖民统治，加紧侵略中国，天主堂疯狂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艾国梁狂吠："共产党是魔鬼，传教就是和魔鬼打仗，从魔鬼手里救得灵魂"。他们散发的反共刊物，公开叫嚣："共产党的错处是在主张人类平等，……主张取消私有制"，而"宗教是竭力维护私有权、社会的制度和秩序，所以和社会主义处以对立的地位"。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天主堂的帝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立即组织反共大游行，宣布所谓共产党的"八大罪状"，叫嚣"共产党是人类的公敌"，并成立"武装保卫团"，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屠杀人民。一九三一年，贺龙同志率领红军路过沈垭，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红军走后，天主堂进行反攻倒算，组织"搜查大队"，私设监狱，在教堂旁边竖立一根上刻"严禁匪类"的石柱，将反抗的群众双手反缚在石柱上毒打，或带上重达数十斤的木枷示众。一九四四年，艾国梁组织了三十多人的"民卫队"，与国民党第五战区、鄂北行署和伪县署勾结，镇压了以丁江兴为首的农民起义，打死起义军二十四人，杀害了中队长唐耀彬和刘春山。一九四八年七月二日晚，艾

国梁收买内奸，暗害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丁江兴，并把丁的头割下，示众三天，以发泄他们对革命的仇恨。一九四八年底，谷城解放后，天主堂勾结一小撮逃进沈垭山区的匪徒，成立反革命武装“马嘉伯义”(意文译音，即教会的武装)，发动反革命暴乱，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区长冯明道同志到沈垭进行征粮支前工作，天主堂勾结匪徒加以杀害。几天以后，当我军进山寻找冯区长遗体时，天主堂又敲钟指挥土匪袭击，使我军伤亡十九人。四月初，天主堂纠合土匪两千多名，攻打石花煤矿，杀害我公安民政助理员二人，抢劫国家粮食十六万多斤。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撕下了沈垭天主堂的伪装，深刻地揭露了它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顽固堡垒。

在人民反抗的怒火中覆亡

哪里有侵略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三百年来，沈垭人民对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七六九年，在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沈垭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高潮，逮捕了进行侵略活动的洋教士及其爪牙一百五十多人。一八三九年，湖北人民逮捕了侵略头目洋教士董文学，解往武昌处死。一八七三年，沈垭人民奋起捣毁了天主堂强行竖立在玉皇顶上的十字架。一八九五年，沈垭人民在捣毁十字架的同时，痛斥了清政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卖国罪行。伟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二百多群众在陈立端兄弟的带领下，曾数次包围沈垭天主堂，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我们党领导的大革命时期，湖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分子惊恐万状，教会豢养的“七狼八虎”等吃人魔王，有的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有的逃窜外地不知去向。一九三一年，贺龙同志率领红军路过沈垭地区，发动群众揭发、控诉了天主堂的罪行，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神甫，搜出了大批枪支弹药，将没收天主堂的粮食、财物，发还给群众，帝国主义的反动巢穴，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一九四四年，沈垭山区燃起了农民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起义军在丁江兴的领导下，攻下同乐、玛瑙和天兴三个乡公所，放出被关押的农民，队伍迅速发展到千余人。接着，起义军击溃了前来镇压的伪保安团，并乘胜攻破了沈垭天主堂，帝国主义分子艾国梁，吓得面色如土，交枪投降。一九四六年，丁江兴与我中原解放军取得联系，改编为房保谷支队，转战木盘山区，不断袭击国民党匪军，多次攻打天主堂，帝国主义分子如坐针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这支革命武装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一直鼓舞着沈垭人民。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沈垭地区，粉碎了天主堂组织的反革命暴乱，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侵略中国、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帝国主义分子艾国梁，镇压了反动神甫李崇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帝国主义苦心经营了三百年之久的反动巢穴土崩瓦解了，“耶稣圣心殖民地”从此云开雾散，沈垭山区迎来了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